

政德大家谈 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主办

《资治通鉴》的治国理政智慧与时代启示

■步媛媛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编纂的《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共16朝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挖掘《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礼法并重，筑牢社会治理根基。《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直击“礼坏乐崩”引发天下大乱的核心症结——周王室衰微，无力维持“礼”的权威，诸侯纷纷突破“法”的约束，最终导致统治秩序崩塌。司马光提出“礼，纪纲是也；法，刑政是也”，阐明“礼”作为道德规范、“法”作为制度约束，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立足新时代，这一智慧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刚性制度划定行为边界；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柔性教化涵养社会文明，真正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第二，德才配位，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构建的“仁、明、武”修心三要为领导干部修心强能、达成德才配位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核心与“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用人智慧一脉相承。“仁”是“德”的核心要义，是“才”的践行根基。司马光以智伯多才少德致家族覆灭的案例警示：缺“仁”之德，才能终将沦为祸端。“仁”即“养百姓”的政治伦理，新时代干部践行“仁”，便

是以“以人民为中心”涵养德行，让专业能力始终围绕为民服务展开，实现德对才的统领。“明”是“才”的关键体现，是守“德”的保障。其要义在“别贤愚、辨是非”，既关乎自身德才修养，更系于选人用人。汉文帝“止辇受言”、唐太宗“以人为镜”，既能修正自身言行、兼顾德才提升，也能坚守标准选贤任能。“武”是将德才转化为实效的支撑，是“断之无疑”的意志。新时代干部的“武”，就是在“敢于斗争”中让德才素养落地为治理效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更需传承这一用人智慧，坚持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标准”，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践行“仁”，以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呼应“明”，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中诠释“武”，切实提升治理素养。

第三，守正创新，激活改革发展动力。《资治通鉴》记载了众多王朝变革案例，核心在于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商鞅变法“徙木立信”确立政策公信力，打破旧贵族特权；北魏孝文帝改革《断诸北语》、推行汉化，促进民族交融。这些成功实践既顺应时代需求主动求变，又遵循客观规律稳步推进。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处理好改革“破”与“立”、“稳”与“进”的关系，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推进各方面创新，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资治通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宗旨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主张高度契合。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治理智慧，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新时代运河“脊梁”的启示

■郭文娜

中国大运河蜿蜒3200公里，贯穿南北，联通古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其中济宁作为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的中枢地带，由于河道地势相对较高，济宁汶上南旺地区就成为了运河的“水脊”。脊，本义指脊椎骨或脊柱，常用来象征支撑力量或核心所在。脊也指中间高起的部分，如山脊、屋脊。历史上南旺作为“运河之脊”主要指这一层含义。万历年间，南旺分司主事题“水衡最高处”，后人称“京杭水脊”。在中国大运河千余年的接力建设征程中，伴随着诸多官员团练“挑大梁”，改造自然利民生的动人事迹，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代运河建设者成为了运河建设中的“中国脊梁”，为我们积淀了深厚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依然激励着党员干部继续砥砺前行，勇往直前。

自强不息：攻坚克难的执着信念。大运河的开凿与疏通，是中国古代治河官民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左传》有言：“秋，吴城郢，沟通江淮。”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到元明两代对运河的不断改造与完善，面对重重困难，他们从未退却。明代南旺枢纽工程，成功解决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水源难题，成就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佳话。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运河建设者，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新时代党员干部应从运河文化中汲取力量，面对困难时，以自强不息的信念勇毅前行，将畏难情绪抛诸脑后，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与担当。

运河新语

■楚梦影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深刻阐释铸就了“由物及理，诚意正心，进而修身治国”的实践纲要，新时期的党员干部锻炼党性、升华修养可作为镜鉴。

以“明辨公私”为修身根基。朱熹“理一分殊”之辨强调“理一”为天下公理。党员干部“格物”首在明辨公与私的界限，于公私交织处穷究事理以保持清醒认知。现实中少数干部混淆亲情与公权边界，将职权视为私属领地，皆因未悟格物明辨之理。党员干部当以“理”为尺丈量言行：家庭生活严守《说苑》“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底线，杜绝亲属借权牟利；工作决策中以人民利益为“理”之核心，破除“面子工程”迷雾。如浙江“千万工程”中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格”民生之“物”，在乡村调研中穷究产业规律，在社区走访中研析治理难题，将“为人民服务”的“理一”落细为务实举措，避免陷入“坐而论道”的空谈误区。

以“克己奉公”为实践关键。朱熹将格物与克己紧密关联，强调以对“物”之理的认识实现对“欲”之私的合理管控，达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觉。现实中，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始终坚守廉洁底线；杨善洲退休扎根山林义务造林并捐林场，他们皆为格物克己典范。反观少数

古树新枝

■冯希

中华文明对于治国理念的探索如同江河奔流般从未停歇，两千年前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如同火种，在当代政治实践中不断淬炼升华。

“民贵君轻”的价值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政实践深刻汲取了孟子“民为贵”思想的核心精髓，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使“民惟邦本”有了坚实的制度依托，遍布城乡的大会代表联络站让田间地头的民意能够直达国家议事殿堂，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中数十万条民众建议的征集吸纳过程，生动诠释着“谋及庶人”的现代实践。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实践赋予古老智慧新的生命力，社区议事厅里的激烈讨论，乡村振兴项目听证会上的热烈发言，都在延续着“集思广益”的治理传统。民法典对私人财产权的全方位保护，既实现了孟子的治国理想，又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到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从民生保障体系的全面建立到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无不彰显着对民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民生诉求的积极回应。

“制民之产”的现代诠释。革命战争年代，革命队伍每到一地就着手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孟子“制民之产”主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新中国成

立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政府致力于扫除文盲、普及基本医疗、改善生产条件，这些举措极大地保障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努力，与孟子强调统治者应“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的施政原则高度契合。进入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的壮举将“鰥寡孤独皆有养”的千年理想真正变为现实，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最需要的群体。这些实践创新既坚守了“解民之忧、纾民之困”的初心，又实现了从保障基本生存到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性跨越。

“明人伦”的思想超越。在当代，教育公平政策的深化实践已经超越了孟子所倡导的“明人伦”的伦理教化目标，进一步将教育视为实现“得民心”与“养民力”双重使命的关键途径。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深刻践行了孟子所言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事。同时，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年龄与时空限制，极大地拓展了孟子所期望的“教民”的深度与广度。教育内容的革新注重培养兼具传统美德与现代素养的公民，致力于塑造孟子理想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并赋予其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培训中心）

孟子仁政思想的当代实践创新

立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政府致力于扫除文盲、普及基本医疗、改善生产条件，这些举措极大地保障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努力，与孟子强调统治者应“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的施政原则高度契合。进入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的壮举将“鰥寡孤独皆有养”的千年理想真正变为现实，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最需要的群体。这些实践创新既坚守了“解民之忧、纾民之困”的初心，又实现了从保障基本生存到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性跨越。

“明人伦”的思想超越。在当代，教育公平政策的深化实践已经超越了孟子所倡导的“明人伦”的伦理教化目标，进一步将教育视为实现“得民心”与“养民力”双重使命的关键途径。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深刻践行了孟子所言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事。同时，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年龄与时空限制，极大地拓展了孟子所期望的“教民”的深度与广度。教育内容的革新注重培养兼具传统美德与现代素养的公民，致力于塑造孟子理想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并赋予其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培训中心）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

乡村建设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关系着亿万农民的生活福祉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不少篇目都对乡村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强调：“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必须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乡村建设为谁而建、怎样建设乡村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深刻揭示了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为推进乡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有关乡村建设的重要论述，要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乡村建设中更好发挥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乡村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农民。经过多年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建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了“从无到有”，正在向“从有到优”转变，当前，乡村建设已进入提档升级的新阶段。要秉持“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的重要理念，广泛凝聚农民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摘自10月9日《人民日报》作者：金姗姗）

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鲜明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以一系列划时代的思想变革和实践创造，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贯穿全卷、分量最重的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我们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自身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篇目和重要思想，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以改革新动能、发展新优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摘自9月29日《人民日报》作者：穆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与 实践

“三链”融合助力乡村治理的汶上实践

■贾冬梅¹ 陈秀同²

汶上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力织密组织链、做强产业链、优化人才链，以组织引领推动特色产业、优质人才等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在助推乡村丰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同时，促进了城乡融合。

织密组织链，夯实共富根基，提升治理引导力。一是组建共富联盟。组织产业园区、物流运输、电商平台等行业党组织与村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按照产业引领、文旅带动、城郊融合等五种类型，成立共富联盟。通过设置“共富联盟公积金”、深化绩效质量考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全方位提升运行实效。二是开展片区联建。通过“片区推荐、县乡联审、组织任命”等方式，建立“县级领导联片、县直部门包村”制度，下沉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业务骨干担任“联合党委发展顾问”，提供政策、技术等全方位支持，先后在片区党委落地项目52个、总投资4.63亿元。三是强化示范引领。聚焦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发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强村公司、村“两委”干部开展“揭榜领题”，鼓励党员带头致富，承接联建项目农产品包装、加工等订单，利用村庄闲置土地、闲散庭院等建设共富工坊、共富基地、共富车间等150个共富实体，吸纳6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做强产业链，激活共富引擎，提升治理内驱力。一是注重规划引领。集中编制现代产业园区和甘薯、芦花鸡、大豆良种繁育等主导产业发展规划，整体打造、统一运营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万兴高效农业示范园等重点农业项目21个、总投资52.3亿元，成功创建省级智慧农业应用基地3家，汶上芦花鸡成功入选第三批“好品山东”地理标志类别。二是

推动村企共建。建立县级牵头指导、乡镇（街道）具体实施、村企协同配合工作机制。实施“党建引领+政村企联盟共促乡村振兴”行动，解决企业用工难、员工住宿难等实际问题。截至目前，全县已有91家企业与107个行政村开展联建共建，新落地项目42个。三是撬动金融支撑。优选从事金融行业的干部挂职副镇长，灵活运用风险补偿、贴息等手段，引导信贷、保险、担保等金融资源向乡村集聚，促成乡村振兴项目贷款，发展“按揭农业”项目。同时，聚焦破解部分小农户创业“贷款难”问题，探索发挥农村宅基地融资功能，创新推出“宅信贷”，为乡村产业全面起势提供有力保障。

优化人才链，激发共富活力，提升治理凝聚力。一是培养强村干部队伍。深入实施村党组织书记“强基”工程，每年选派村党组织书记到异地挂职，体悟实训，学习先进经验。同时，培育储备一批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和致富带头人，2024年累计储备后备人才1840名。二是打造“合伙入”队伍。在全县设立乡村振兴工作站6处，围绕芦花鸡、白莲藕、牛蒡、柏子仁等特色产业进行品牌化运作，以产学研合作吸引高层次人才，助推产业发展。2024年对接回引在外优秀人员56名，引导返乡创业、反哺家乡。汶上县荣获全国首批“博士小院”。三是强化帮扶力量。开展“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驻村帮扶，成立“第一书记联盟”，完善磨擦互鉴、考勤考核、协商议事等管理运行机制，推动帮扶村资金整合、项目共建、资源同享、信息互通，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2024年整合省市县帮扶资金113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92个，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70余万元。

（作者单位：1.汶上县委党校 2.汶上县委组织部）

济宁传统企业提档升级，赋能济宁产业数字化转型。

“借势力”，即通过招大引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通过靶向招商，实现“以链聚势、聚链成群”。通过产业招商促进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济宁招大引强的一条重要措施。济宁邀请国际顶尖研究机构、11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对19条核心产业链进行研究论证，“一链一策”制定招商“路线图”，招商赋能产业发展更加精准有效。初步统计，济宁市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中，19条核心产业链项目占比近80%。济宁高质量招商能够不断取得新成效得益于坚持把招商建在产业链上。依托链主企业开展精准招商，随着产业链延伸，被招商企业从配角角色成长为新的链主，形成集群式发展。近几年，济宁积极建设宁德时代、小鹏智能制造、长城新能源汽车等重大项目，同时，继续因地制宜发挥相对优势“招大引强”。2024年6月，莱赛尔纤维项目落户鱼台县，济宁绘制了莱赛尔产业招商图谱，梳理上下游目标企业，实施靶向招商，实现“以链聚势、聚链成群”。招大引强“聚链成群”，实现战略型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新能源汽车制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投资50亿元的金龙零碳交通产业园项目，主要生产新能源车专用车、无人驾驶车辆等；德国大陆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主要生产发动机传感器等；再加上从事混动变速箱、双电机控制器生产的馨联动力汽车项目，逐步形成由汽车配件到整车制造的全产业链条。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又要求将普遍性原则与地方性知识灵活适配，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具体表现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呈现加速演进态势。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以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新兴业态模式持续涌现，形成多维度、复合型的乡村经济结构转型路径。上述成就的取得，体现了制度供给与农村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本质上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性制度创新与战略深化，为理解新时代中国农村改革从“增量改革”向“质量变革”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典型范例与实践智慧。以滕州市西岗镇为例。近年来，该镇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充分整合九龙湾乡村振兴示范区各村景观、设施、土地、产业等要素，打造了集高产种植、果品采摘、康养旅游、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九龙湾农文旅融合示范产业集群，成功探索出“村企联建、景村融合”的发展模式；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以乡村联建齐鲁样板示范区为引领，打造了九龙湾湿地特色文化旅游品牌，走出了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创新，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而亿万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践实践，则为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确保了政策的落实。这种双向逻辑构成了中国走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密码。展望未来，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空心化加剧，数字经济带来新的挑战，多元价值冲突对乡村治理和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必须继续坚持和深化这一逻辑，推动制度向“精准化”升级，鼓励实践与基层实际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乡村内生活力，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滕州市委党校）

“借力”发展助推济宁传统产业转型

■范文君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近年来，济宁通过实施两个“借力”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市情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子，助推传统产业转型。

“借能力”，即借高新技术企业能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首先，促进数字实融合，强化数字赋能转型。济宁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数字发展动能。济宁聚焦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电子、智能终端等核心产业，实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倍增行动，2024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超660亿元，同比增长10%以上。其次，充分利用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济宁致力于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转型关键期，传统产业的“压舱石”作用愈加凸显，把数字经济作为重塑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在济宁发展中步入新阶段。第三，全面开展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行动。发挥工业大都市制造业基础坚实的优势，推动全市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89.1%，超全省平均1.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浪潮智能生产正式落地数智云梁（济宁）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助力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逻辑与乡村振兴实践智慧

■李姗姗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一战略部署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传承，更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深化与创新。中国自1978年底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启“包产到户”，到如今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中国已走过47年农村改革之路，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从“生存驱动”到“发展引领”的历史性跨越。不仅创造了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还为全球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制度样本，进一步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智慧。

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农村制度变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重构和市场化改革。改革初期，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制度突破，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安排，将土地经营权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剥离出来赋予农户，实现“分田到户”。党的十八大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村改革转向要素市场化配置，重点突破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这一阶段逐渐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产业单一化等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聚焦产业融合与城乡统筹，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总的来看，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体现了从生产关系调整到市场化改革，再到城乡协调发展的递进式制度创新路径。无论是阶段性突破，还是系统性演进，其最终都指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实践角度来看，我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把握多重关系的辩证统一。既强调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相结合，也注重